

寄情山水吟诗著书

结交当地文人贤达 寄情风物沉醉著书

王铎归乡后，家居近三十年，耽静乐善，恬淡冲和。优游林下，工于诗赋，常与李澄中、张侗、孙必振、冯奠、陈卜等家乡友人交游。这些人是诸城当时有名的文人与贤达，李澄中与张侗还是诸城久负盛名的“十老”。

李澄中(1629—1700)，字渭清，号渔村，山东诸城箭口辛庄子村人，后迁居县城超然台下。出身书香门第，自幼聪慧，饱读诗书，尽管才华横溢，却官运多舛，乡试屡试不第，因而厌倦科举，专心学诗，交游甚广，诗赋流传大江南北。清朝为招揽民心，选拔专业人才，于康熙十七年(1678)，设博学鸿词科，命各地官员举荐知名文人入京殿试。当时山东推荐三人，其中有李澄中与王铎。康熙十八年(1679)三月，博学鸿词科考于体仁阁举行，共录取50人，李澄中考取二等第十六名，授为翰林院检讨，纂修《明史》。诸城科举史上，仅明清两代，进士及第者达128人之多，而举博学鸿儒者，山东惟李澄中一人。

康熙三十年(1691)，李澄中因气愤小人在皇帝面前恶意中伤，辞官还乡。他一生广泛交游，诗文唱和，成就很高，与当世的王士禛、田雯并称“山左三大家”，有《卧象山房文集》四卷、《诗集》七卷、《赋集》一卷、《良斋文集》八卷、《滇南日记》三卷。另外尚有《五岳志》《齐鲁纪闻》等未刊行于世。其诗、赋及墨迹等部分珍藏于诸城市博物馆。

另一位“十老”之一的张侗(1634—1713)，诸城普庆村人，是清初著名学者，诗、书、画冠绝当时一邑。他与族兄弟张衍、张佳、张倬并称“四逸”，以家族的放鹤园为聚集地，先后邀请海外百余文士聚会结文社于此，吟诗歌赋，繁盛一时。他爱好游历，卧象山谷，游九仙山、五莲山、琅琊台，泛舟于斋堂、沐官等岛屿，南至白下(今南京)，北到蓟门(今北京东)，以山水友朋为乐，著有《放鹤村文集》五卷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有著录)、《其楼诗集》一册、《卧象山志》一卷、《鲁论言外录》一册、《大学解》《续大学问》《三才传》《三古纪略》《读四子书》等已佚。

王铎除与这些文友游山玩水、吟诗赋文外，主要精力用于著书。他文学渊博，工诗，著作颇多，著有《水西纪略》《粤游日记》《星余笔记》《读书叢残》《暑窗臆说》《朱子语类纂》等，被后人编为《世德堂遗书》。

谥号“文贞先生” 荫泽后世子孙多有功名

王铎，寿终于康熙四十四年(1705)，享年81岁，谥号“文贞先生”，崇祀乡贤祠。他仙逝那年，正值康熙第五次南巡，祥风时雨，国泰民安。他功德圆满，寿终正寝，其子孙后代出类拔萃，多有功名。

评价王铎的一生，他虽曾为官一任，也颇有政绩，但毕竟从政时间太短，仅6年，相比他81岁漫长的人生经历而言，只是人生旅途一段短暂驿路。因此，评论他人生价值不能单以从政而论，更要看他豁达超然的人生态度与博学勤勉的治学精神。他一生吟诗作赋，文采

斐然，著作颇丰，称其为文学家、诗人也不为过。他一生流连忘返于山水，寄情于风物，心系于地理，撰写《粤游日记》《水西纪略》《星余笔记》等知识性与文学性俱佳的地理专著，完全堪当地理学家。

王铎有四子，皆功名成就。长子王沛思，康熙十八年(1679)进士；次子王沛懋(jùn)，以例贡考授州同知；三子王沛檀，康熙甲子举人，赐进士，左都御史，一品衔，为相州王氏家族官职最高的；四子王沛恂，康熙丁卯年举人。王沛恂之孙王元葵为乾隆三十一年(1766)进士。

《水西纪略》与《星余笔记》都是记录当地风物的，主要记录人文、历史、地理、风俗、物产等，其中《水西纪略》是写家乡水西村的。水西村原属诸城市，现为高密市，分为前水西、后水西两个村。水西西邻潍水，东为红绣河，水肥地沃，人杰地灵。它与刘墉老家逢戈庄毗邻，在逢戈庄村后。水西王家也曾是诸城的名门望族，崛起于明末，是清代著名的书香门第，以《易经》为家学，清代水西王家有王劝、王度昭、王辂、王中孚、王靖、王汝瑶等6位文进士、王筠1位武进士，另有10余人中举人，孕育了浙江巡抚王度昭、会元王中孚、池州知府王辂、词人王景祺等才子名流。

王度昭(1651—1724)，字玉其，号带河，清代初年诸城水西社(今高密后水西村)人。康熙二十一年(1682)进士，康熙三十一年(1692)授云南浪穹县(今洱源)知县。康熙三十六年(1697)入京为浙江道监察御史。历补云南道监察御史，迁光禄寺卿，顺天府丞，再擢大理寺少卿，左金都御史，太常寺卿，通政使。康熙四十九年(1710)，出署湖南偏沅巡抚(驻长沙)，又授浙江巡抚，于两省军政多有疏奏。康熙五十年(1711)兼署江宁巡抚，后两年召为工部侍郎，官至兵部左侍郎，致仕。卒于家。

相州王氏家族与水西王家世代交好，多有来往，王铎辞官回乡，曾到水西多次，时常小住，并撰写了《水西纪略》。

《暑窗臆说》属于文史方面的书，是王铎归乡之后于晚年所著。记载了他在西宁地区的治理经验，包括如何处理地方事务、应对自然灾害、管理百姓等；记录了一些历史事件，尤其是与西宁地区相关的重大事件，如边疆治理、民族关系等，包含了许多他个人的思考和感悟。



西寧城郭圖

辞官西宁留备用金 百姓为其建王公祠

在北方，农历二月正是天寒地冻之时，相州东边的潍河还被厚厚冰层覆盖着，听不到河水流淌的声音。而在近四千里之外的西宁，已是河开溪流，鸟语花香，到处生机盎然、景色明媚，但此刻的王铎，面对正被战争撕裂的这片秀美土地，感到十分沉重，他怀着无限失意与恋眷的心情向待了六年的西宁告别……

送行的官员与百姓见他行李萧然，想到他在此为官这么多年，竟然如此寒酸，就临时起意，商定一起给他筹集路费。在当地乡绅的召集下，大家纷纷解囊，当场筹得白银60多两，这让王铎十分感动，但他怎么也不接受赠金。最后，他与乡绅们商定，他再拿出40两银子，与这60两一并作为西宁百姓的应急备用金，以供灾荒之年急用。他见百姓拒绝，就情深义重地说：“我王某，虽然不任知县了，但心中会一直牵挂西宁百姓的冷暖饥饱。

假如天有不测之风云，百姓就可以得到及时救济。这也是我为西宁百姓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，务必请西宁父老乡亲成全我王某这最后的心意。”

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在王铎离开西宁后的19年，西宁县先后于康熙三十三年(1694)、康熙四十年(1701)两次遭遇饥荒，县衙动用这些银两及收益，赈济了不少灾民。

康熙五十九年(1720)，西宁百姓为追念王铎知县的遗爱，商定用这笔备用金，在祭祀苏致卿知县的遗爱祠右边，修建一座王公祠，以祭祀王铎。并购置祠田八十余亩，以其租金作为祭祀开支。康熙六十年(1721)，知县田幼安撰写《邑侯王公建祠置田碑记》，并立碑祠内。雍正五年(1727)，王铎入西宁名宦祠，接受祭祀。王铎在西宁为官六年，却被西宁百姓铭记至今。